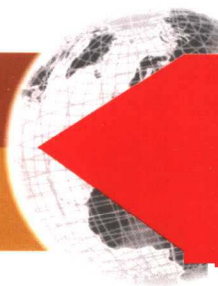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国内 政治经济与 对外关系



杨光斌 李月军 等 著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国内 政治经济与 对外关系



杨光斌 李月军 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杨光斌等著.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7-300-07929-5

I. 中…

II. ①杨…②李…

III. ①政治-研究-中国②经济-研究-中国③对外政策-研究-中国

IV. D6 D8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8589 号

中国国际战略研究系列丛书

中国国内政治经济与对外关系

杨光斌 李月军 等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7.625 插页 1	印 次	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03 000	定 价	1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第一章 政治变迁中的中国对外关系	1
第一节 从意识形态化政治到务实政治	1
第二节 国家—社会关系的变迁与对外政策	13
第三节 民族国家构建与对外关系	23
第二章 经济变革中的中国对外政策	39
第一节 中国经济变革的历程	39
第二节 中国经济变革的主要内容	45
第三节 应对经济变革与对外政策调整	52
第三章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对外政策	67
第一节 全球化的概念、表现和影响	67
第二节 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中国对外政策调整	78
第四章 中国对外政策的领导体制与决策机制	92
第一节 全球化时代特征与国家根本利益	92
第二节 党政关系下的外事领导体制	99
第三节 政策过程与决策模型	113
附 录 涉外问题研究的专家类型与来源	129

第五章 中国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	144
第一节 参与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政府机构.....	144
第二节 影响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内外因素.....	157
第三节 对外经济政策制定的具体阐释： 以中国复关/人世为例	161
第六章 中国地方政府与对外关系	173
第一节 省会城市参与对外交往的理论分析.....	176
第二节 福州对外交往的现状特点.....	205
第三节 福州参与对外交往的潜力与局限.....	221
结 论 中国省会城市参与对外交往的启示.....	236
后 记	240

政治变迁中的中国 对外关系

一个国家的外交或对外政策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续，抛开国内事务，就不能理解它的对外关系，这是国际政治领域中一个常识。但很少有研究成果能够真正厘清国内政治变迁对外交的影响。正如大卫·H·克拉克所说“现有对国际关系的研究大多没有意识到政策选择有赖于正式政治变迁，也很少（如果不是根本没有）注意到国家领导人用一种政策代替另一种，因为他们发现政策的绩效是随着他们面临的挑战变化而变化的。尽管有的学者逐渐意识到一国的国内特征与国际行为的相关性，但他们常常把国家按体制或政体进行静态分类。”^① 本章主要以中国为例，尝试着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来分析对外政策的变化，侧重分析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第一节 从意识形态化政治到 务实政治

新中国成立后的近 30 年里，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涂上了浓

^① David. H. Clark, *Domestic Institutions and Foreign Policy*, The Florida State University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Dissertation, 1999. UMI No. 9939279. p. 4.

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在政治领域形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化政治。这种意识形态总的来说是一种革命式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化政治主要特点是以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来观察评判社会与政治现象，认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人民与敌人、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是对立的，存在根本的冲突与矛盾，并且是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强调精神的力量，政治斗争的重要性，忽视物质利益对人的能动性、积极性的激励作用，其典型表达就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抓革命促生产；以宏大地实现全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最终目标，并急于建成共产主义社会；在集体与个人关系方面，强调党、国家、集体的利益至上性，严重忽视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狠批私字一闪念。这种意识形态化政治对中国外交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精英决策与大众对外交的理解两层面。因为意识形态“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①。“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有意识地把许多观念运用于外交领域，这些观念源自马克思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形成一种正式的观念体系，它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观察世界、解释现实的棱镜（prism）。此外，观念、价值观、假定和偏见等非正式意识形态常常在无意识层面起着作用，它们塑造着中国精英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影响着他们的外交政策选择”^②。

革命家的暴力革命与长期战争的经历养成了一种战争文化心理与思维模式，这正是毛泽东时期意识形态化政治的渊源与主要特征。从代际成长和政治社会化的角度来讲，在革命的一代当政后，这种历史形成的心理与思维模式对中国国家建设与外交政策产生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意识形态指导

① [美] 迈克尔·亨特：《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1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

② Steven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omas W. Robinson David Shambaug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

人们对于世界的真理和价值的确定认识，是一个人和一个国家现实行动的根本依据，因而限制了其对于国际现象的表达方式和态度倾向。革命的一代以其战争文化观念来看待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政治现象，同时也源于这种观念的意识形态处理对外关系。

在革命时代，“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朋友”；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等决策者主要从革命者的角度，根据中国革命的理念和经验，认识世界和未来新中国与世界之关系，认为“今天开辟外交战线首先要认清敌友”^①。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新中国成立前后，对帝国主义“不承认”和站在苏联阵营一边（后一被简称为“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三项对外关系的原则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革命性和意识形态化特征。以“一边倒”的方针为例，毛泽东从意识形态看中苏关系较多，经常强调苏联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大国，应当团结一致；这种团结一致首先表现为以苏联为首，苏联是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和中心，中国应当维护苏联的威信等。为了做到这一点，中国有时需要牺牲国家尊严甚至国家利益。例如，被迫承认当时一些对中国不平等的条约和协定，主要涉及外蒙古独立、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和新疆的特权等问题，这实际上影响了中国的独立自主。毛泽东后来也承认，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初“未发一枪一弹就抢了一大片土地。他们抢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他们抢了一半的新疆和东北的满洲，还说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②。

分清敌人与朋友之后，就要联合朋友，建立统一战线，抗击敌人，这是革命意识形态的经验，可以说是成功的经验。新中国成立后，把这一经验运用到对外政策领域，试图建立国际统一战线，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和平共处五项原则、20世纪50

① 杨公素：《当代中国外交理论与实践》，248页，香港，励志出版社，2002。

② 《美中70年代基辛格毛泽东周恩来密谈曝光》，载《中国时报》，1999-01-

年代到60年代中期与苏联结盟、70年代第三世界理论的提出、国际主义等都表明了中国把革命的统一战线理论扩展到对外政策中去的意愿与实践。但问题在于，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理论是基于对国内社会政治的阶级分析，而国际关系的主体却是现代民族国家或者说是主权国家。以革命的统一战线理论搬到对外关系领域，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失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一定程度上是实现“一边倒”政策和在冷战格局下求得更大生存空间的权宜之计，它意味着要创建一个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联盟，以打破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前提和手段。需要深思的是，“五项原则”旨在维护现存国际关系的政策与中国作为革命国家的最终理想之间的关系。在中国领导人那里，实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想与遵守现存国际秩序之间一直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矛盾。特别是毛泽东，充满了革命的理想，对现存国际秩序有一种强烈的反叛思想。在他看来，民族独立自强的目标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实现革命理想意味着不仅推翻国内的三座大山，而且意味着改造不公正的国际秩序。但为了维持中国现实安全利益又需要中国领导人与现存国际关系妥协。在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毛泽东把“五项原则”视为一项长期的方针，但从根本上说，它只是实现其最终革命理想的权宜之计。在这一点上，他与列宁的“和平共处”思想有极大相似之处。一旦他认为革命力量足够强大，“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就自然地会转向革命外交，不再愿意与资本主义世界“和平共处”，更多地强调斗争。^①

又例如，以阶级分析来看待国际政治格局，就建构出一个所谓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想象出一个超越国家利益的国际利益，认为“一个国家的利益应当考虑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利益，特别

^① 参见任东来：《从“两大阵营”理论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对民族主义国家看法和政策的演变》，载《太平洋学报》，2000（4）。

是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要求一个国家的利益服从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一国应当为世界的整体利益做出最大的民族牺牲”^①，以革命输出世界革命，去实现全世界共产主义社会。^② 这种外交观念与实践否认国家利益在制定和实施外交政策过程中的首要地位，遮蔽了从各国的国家利益的一致性与冲突性来考虑外交战略与具体策略的可能性。如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明确宣布，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指导原则”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再如第三世界理论是直接由过去的支持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解放和自由斗争的政策发展而来的。在过去，这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代名词，其中包含了鲜明的意识形态因素。我们不难看出，意识形态所定义的国际道义和绝对正义，成为中国外交实践追求的目标。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观念与战略，虽然使中国得到了一些利益，如第三世界的支持是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重要因素，但也使正常的国家利益遭受一定程度的损害。还有，反对霸权主义也是以国际道义为最终标准，但在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和国家之间利益纷争的状态下，很难说有什么绝对的国际道义与正义。如中国在 20 世纪 60 年代，把国家利益放在纯粹的道义上，推行“反帝、反修”的对外战略方针，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为敌。这固然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不依附他人的鲜明形象，但却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为中国必须进行两线作战，同时承受着来自东西方的双重压力，不仅在世界上十分孤立，而且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也缺乏应有的国际环境。20 世纪 60 年代末，在苏联对中国的威胁远远大于美国的威胁，而美国又有“联中抗苏”的意向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提出：两

① 叶自成：《新中国外交思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67 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② 1962 年 1 月 27 日，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中共在取得国家政权后，要支援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一直到共产主义世界的实现。

霸中我们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这就是我们的政策。^①

毛泽东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受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的另一个表现还在革命的张力与扩展意识上。中国表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中国革命胜利了，当然要对中国境外的革命运动予以关注和支持。中国渴望中国革命的胜利在全世界，至少也要在中国的周边地区产生巨大的影响。^② 世界革命理论构成了新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毛泽东等人一再强调革命不能输出，但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支持世界革命的口号与理念对中国的外交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刘少奇为援越抗法起草的批示比较典型地展示了这种革命扩展意识。他说，中国革命胜利后，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去援助亚洲各被压迫民族中的共产党和人民争取他们的解放，乃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不可推辞的国际责任，也是在国际范围内巩固中国革命胜利的最重要的方法之一。^③ 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新中国一成立便开始向胡志明领导的越南共产党提供支持和援助。在1949年11月召开的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刘少奇明确地将许多国家定义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并畅谈亚洲国家的革命形势和武装斗争的发展。他还宣布中国革命的胜利对于那里的“民族解放战争”既是鼓舞更是榜样，而且新中国还承担援助那些国家革命的“繁重的责任”。^④

① 转引自《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181~192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

② 这方面较有代表性的论述可见周恩来：《民族解放运动的地位和作用》（1951年4月9日），见《周恩来外交文选》，34~3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130~13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③ 参见中共中央研究室编：《刘少奇年谱1889—1969》，下卷，24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④ 参见刘少奇：《在亚洲澳洲工会会议上的开幕词》（1949年11月16日），见《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130~139页；刘少奇：《在北京各界庆祝亚洲澳洲工会会议成功大会上的讲话》（1949年11月23日），《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1册，145~150页。

问题是，新中国既然公开宣布，视支援许多国家的革命运动，特别是支援武装斗争为己任，它同这些国家的政府便难以发展正常的关系。此后的抗美援朝、抗美援朝都比较明显地体现了这种世界革命的思想。到60年代中后期提出了“中国革命中心论”，过高地估计了中国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和影响力，自诩为“世界矛盾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中心”，中国向何处去是“关系到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问题”，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命运的一件头等大事”等等。后来，这种世界革命的思想观念发展到极致，导致了红卫兵围攻苏联大使馆，砸印度、缅甸、印尼等周边国家驻华大使馆等外交事件，严重影响了中国外交的正常化。

另外，出于国际道义与输出革命的需要，中国对所谓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大量的无偿援助，在物质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在毛泽东看来，中国有6亿人口，是一个世界大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贡献，应当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这是中国的责任和义务；为此，即使中国再苦一些，也要尽力给第三世界国家多一些援助。据统计，1950年到1975年，越南两次陷入战争灾难时，中国人民节衣缩食，在自己尚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竭尽全力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救国战争，提供了总计达200多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无偿援助，先后派遣专家、顾问2万多人。在抗美援朝中，作为越南人民的“坚强后盾”和“可靠后方”，中国派出32万工程兵和防空部队，其中1442人献出了宝贵生命。^①向阿尔巴尼亚提供的援助相当于使阿每人获得一吨粮食、半吨钢、4000元人民币。^②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八项原则。其提出的历史背景是：国际上安全环境的恶化，中苏在围绕着包括对待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持何态度在内

① 参见张青：《渡尽劫波兄弟在——忆实现中越关系正常化的“成都会晤”》，载《世界知识》，2000（2），38~41页。

② 参见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载《世界知识》，2004（4）。

的问题辩论正酣，国内政治斗争“左转”、“三斗一增”成为中国的外交政策。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中国曾经把自己财政支出的6.9%用于对外援助（1975年）。^①五六十年代，中国在自己的经济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仍尽力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据统计，从1956年至1966年，中国对几内亚、马里、阿尔及利亚、索马里、刚果、阿联（埃及）、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赞比亚、毛里塔尼亚等12国总共提供了4.28亿美元的援助。^②从1970年至1977年，中国对非援助总额为18.25亿美元，比1956年至1966年提供的援助增长了4倍多。

尽管这些巨额的对外援助不乏出于国家利益而为的情况，但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的援助。把大量物资无偿输出给“兄弟国家”，不仅使饿着肚子的中国人民背上沉重的负担，透支了中国的国力，大大影响了国家建设，最终也不利于中国自身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高。而且这种以物质换来的所谓道义与友谊有时很不可靠，后来中越、中阿（指阿尔巴尼亚）反目成仇，中越不惜刀兵相见都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意识形态化政治对毛泽东时期中国的对外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完全决定了决策者的意志，从而完全忽视了国家的利益；只是说，出于意识形态的价值判断与取向影响了中国外交的战略与策略选择，意识形态在一定程度上框定了他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与体验，有时不得不出于意识形态的需要而损害国家利益，实际上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纠缠在了一起。有的学者认为“当我们考察1949年后中国的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时，又遇到正式的意识形态与中国所追求的具体外交政策之间存在明显的不一致性的问题”^③。例如，尽管毛泽东

① 参见张清敏：《中国外交的“变”与“不变”》，载《世界知识》，2004（4）。

② Cf. David E. Alaright, *Communism in Africa*, Condon, 1986, pp. 170-171.

③ Steven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omas W. Robinson David Shambaug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36.

多次强调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间“有九个指头的共同，一个指头的不同”，但在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苏交恶的过程中，意识形态方面的“九个指头的共同”没能弥合利益分歧而产生的裂痕；而“一个指头的不同”却极大地促使中苏关系崩溃。^① 这一方面说明了意识形态在中苏结盟中起着界定各自利益的角色；另一方面也说明在国家利益冲突时，意识形态只是成为实现国家利益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较快地摆脱了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务实政治。随着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逐渐打破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立的二元思维模式，实行了对外开放（全方位的开放，主要是对西方国家的开放），中国的对外政策也逐渐走向正规化和正常化，原来的意识形态化思维开始淡出外交领域。外交实践中，务实的风格日益浓厚；对外战略实现了转变，国家的主权与利益被放在发展对外关系的首要位置。调整是基于对战争与和平问题的重新认识，“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作出了“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战略判断。不再输出革命，不再当第三世界的头，中国改变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执行的“一条线战略”，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实行真正的不结盟，真正把“和平共处”原则作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不是权宜之计。

鉴于毛泽东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经验与教训，新时期中国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时，“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实践证明，社会制度的异同和思想意识的差别不应该成为国与国之间和平相处的障碍，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应“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外交工作在处理国家与国家关系时要超

^① 参见洪停杓、张植荣：《当代中国外交新论》，190页，香港，励志出版社，2004。

越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的差异，求同存异，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搁置双方的差异，在“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基础上发展关系。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的中苏关系改善的条件，将现实问题的解决置于首位，重点由意识形态的争论转向了国家利益的考虑，显示出日后中国外交政策调整的趋向。^① 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指出，至于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回过头来看，双方讲的都是空话。那些争论，我们也不相信自己全是对的。讲到这里他特别强调，讲这些过去的事，目的是为了前进，不是要求再和苏方进行辩论了。这些历史账讲了，问题就一风吹了，重点是放在未来。^② 中国对苏东剧变保留自己的看法，但依然本着务实的态度，以国家利益为重，与俄罗斯及东欧诸国迅速建立起超越意识形态的友好关系。正如《中俄联合声明》所强调：各国人民自由选择其发展道路的权利应受到尊重，社会发展和意识形态的差异不应妨碍国家关系的正常发展。^③ 本着同样的外交原则，中国先后与美国、以色列、韩国等原“美帝国主义阵营”的盟国及地区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后，中国并没有因意识形态因素和西方对中国的封锁，而退守重返闭关政策，而是以务实的态度、灵活的外交方式，较快地实现了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当然，社会制度的不同、意识形态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摩擦、纠纷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当今世界有的国家正是以此来推行其强权政治，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淡化”，不可能“融合”。同时，中国内政外交的意识形态的淡出也是一个分层次、分领域的渐进过程，意识形态因素在特定的历史时刻还会影响到对外政策，不过已经不可能像过去那样成为外交实践的

① 转引自钱其琛：《外交十记》，6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② 参见上书，37页。

③ 参见《中俄联合声明》，载《人民日报》，1992-12-19。

战略了。正如有的研究者所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概念和语言继续影响着中国领导人的思维,他们继续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调整外交政策选择。但是,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决策的过程中的作用逐渐减弱,在专业外交政策方面更是如此”^①。

邓小平去世后,中国外交政策上的务实风格更加明显,意识形态色彩越来越淡,国家利益越来越成为主导因素。“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中国对全球事务采取的措施基本是被动的,总是用‘百年耻辱’的受害者心态来审视国际事务和中国在其中的地位”,然而“最近几年,中国已经开始采取更加不对抗、更加老练、更有信心、有时更有建设性的方法去应对地区和全球事务”^②。在“搁置争议”的原则下,中国不但保持了与周围邻国的良好合作关系,而且正在一步步推进边界问题的解决。1999年,中国和越南签署了《陆地边界条约》,第二年签订了关于北部湾的大陆架划界协定;中俄之间也以法律形式确定了协商一致地段的边界;2002年,中国与东盟国家一道就南沙群岛问题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3年,中国又正式加入涉及政治和经济安全的《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中印之间的边界谈判也提高了规格;在反对霸权主义方面,既声明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又以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谋求最大化的国家利益,这都体现了中国逐步抛弃了情绪化的决策方式,外交越来越务实。2003年6月1日,胡锦涛出席世界工业八强首脑会议,这是他当选中国国家主席后的首次出访。法国《欧洲时报》认为,如果一定要以一句简单的话概括当今世界的外交趋势的话,就是意识形态色彩逐渐为务实与实力所代替。胡锦涛的首访既表现了中国外交的

① Steven I. Levine, Perception and Ideology,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Thomas W. Robinson David Shambaug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5.

② [美] 麦艾文、泰勒·弗莱维尔:《中国新外交》,载《外交》,2003(6)。

务实端倪，也表现出中国外交与时俱进、逐渐放弃一些意识形态束缚，进一步按国际游戏规则办事的愿望。^① 2004年1月，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中美贸易全国委员会等美国九个团体联合举行的欢迎晚宴的演讲中，温家宝总理强调：“综观世界近代史，大国之间合作的深厚基础在经济，在国家利益，而并非意识形态。”^② 这种抛弃僵化的意识形态思维更具进步意义的地方在于，它表明中国更具全球化的战略意识。中国在对美国华尔街和华盛顿不同规则的认识上更趋清晰，因而采取的策略更务实。

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务实化还表现在对外援助不再以意识形态为出发点，而是遵循权利平等、经济互惠的原则。1983年初，我国提出了开展中非经济技术合作的四项原则：“平等互利，讲求实效，形式多样，共同发展”，使中非经济关系从中国对非洲提供经济援助为主转变为中非开展互利合作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对外援助采取政府贴息优惠贷款、推动援外项目合资合作的方式，对外援助的主体由双方政府逐渐转变为双方企业。1995年10月17日，原外经贸部部长吴仪在全国援外改革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今后一般不再向受援国提供新的无息贷款，但要扩大政府贴息优惠贷款的规模，同时适当增加无偿援助的比重。^③ 这一方面扩大了对非援助资金来源，提高了援助效益，更好地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以收到双方互利互惠、共同发展的效果，从而实现了国际道义与国家利益的双赢。

① 参见《法媒体认为胡锦涛初次出访凸显中国外交新思维》，载《中国新闻网》，2003-05-31。

② 转引自李鸿谷：《温家宝访美——“华尔街与华盛顿是不同的概念”》，载《三联生活周刊》，2004（1）。

③ 参见邹春义：《我国将进一步改革援外工作》，载《人民日报》，1995-10-18。